

贾振勇 著

诗与史的共鸣

主编：王光东、吴义勤
新世纪批评文丛

文化的回响
大师的风范
经典的解说



上海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批评文丛

主编 王光东 吴义勤



诗与史的共鸣

贾振勇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史的共鸣/贾振勇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8

(新世纪批评文丛/王光东,吴义勤主编)

ISBN 978-7-81118-482-2

I. 诗… II. 贾…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724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许 鹏

装帧设计 庞遵云

诗与史的共鸣

贾振勇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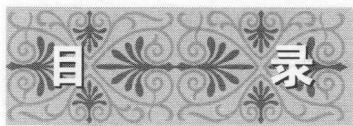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57 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81118-482-2/I·100 定价:29.50 元



第一辑 历史的回响 文化的回响 1

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 2

——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失落精神的民族，呼唤伟大的人格 11

——“五四”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一瞥

历史的平衡，文化的平衡 21

——简论“五四”文化保守主义

跨越外部与内部、历史与审美的鸿沟 45

——以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为例

现代性平台上的理性、革命与文学 72

历史激流中的政治抉择 89

——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和政党政治

青春的逃之恋 111

——70 年代生作家小说的文化内蕴和价值取向

第二辑 大师的体验 大师的风范 121

鲁迅生命尽处的自我理性审视与调整 122

——从《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起
诗与政治的共鸣 140

——1940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意识形态想象与郭沫若史学研究 158

——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

“遍地皆诗写不赢” 172

——大跃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

《李白与杜甫》：郭沫若隐秘的心灵自叙传 190

激情、经验与政治理性 201

——茅盾小说政治与才情的相生相克

第三辑 经典的魅力 经典的解说 213

文学史权力、秩序与经典解读 214

《伤逝》及“娜拉出走” 229

——鲁迅对现代女性解放神话的质疑

性与革命：作为主题与象征 240

——《蚀》三部曲的政治文化诗学阐释

当审美遭遇政治，当娜拉遭遇革命 253

——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坛的意义与启示

“蔡文姬就是我！” 265

——从政文人郭沫若隐曲心声考释

后记 291

第一辑

历史的回响 文化的回响

五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坐标原点

——兼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华勒斯坦，曾批判普遍主义不是作为自由流动的意识形态出现，而是由在历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鼓吹出来的一种强者的价值观念，隐含着不平等的价值标尺，他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贡献于世的。我恐惧带礼物的希腊人！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种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会扭转实际权利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①面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创造，及其随之而来的研究史，我们不能不痛切地感受到，我们早已经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这样一个尴尬的悖论式的文化语境之中。

综观最近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论争，其话语表达体验尤其令人感到焦灼和痛切。无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定义为近代性或者现代性，还是强调它在时空表现形态上的独特性，论者大都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系统中有关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叙事话语所表现出的普遍主义的价值尺度。借鉴华勒斯坦对普遍主义的批判视野，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无论是依据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评判体系，还是从民族主义的文化视角来阐释和界定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发展进程中的

① 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51 页。

性质,一方面只能以西方话语系统中作为形态的现代化和作为质态的现代性的共通性标准为前提;另一方面必须将之置放于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中考察它的有效性及其衰减和增值现象。因为,并没有与西方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也自有它具体的历史规定性。20世纪中国文学,既有世界文学范围的现代性的同质性,更有特定民族、特定时空的异质性。

在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所持的标准,与社会科学诸多文献资料中广为流行的标准大体相当,即突出强调具有普遍性的、具体的和成就取向的准则,强调现代化是结构和形态、文化取向和价值系统由古代范畴向现代范畴的转变,强调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具有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可视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以及精神领域的非理性个体化的互动发展过程。实际上这是在勘察现代化共生特质过程中,归纳和演绎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化的理想典型,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文化认识观。显然,普遍主义价值认知观成为了大多数论者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潜层理论依据。由此出发,大多数论者在将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评判体系,并以此为价值参考系时,忽略了文学现代性的同质性、文学现代化的同构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境遇之间广阔的关联域。正是在这一广阔关联域中,20世纪中国文学所展现的特殊的“个性”,才能真正构成勘探其性质的切入点和原点。

显然,过去大多数论者往往以西方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其现代性的品质标准,来衡量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程度和现代性的质量,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系统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叙事圈套中。后果之一:忽视了其中隐含的西方话语霸权的知识权力倾向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使20世纪中国文学沦为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载体与呈现者,成为西方文学现代化的中国版本。后果之二:忽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西方各国文学在进程、模式及品质上的

差异性与特殊性。后果之三：忽视了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变形过程的复杂性，尽管这一过程具有一些共通的特征，但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其特殊的品格和面貌，正是这一特殊的品格与面貌构成了文学现代化的一种类型，20 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属于这一类型的精神展现形式。后果之四：忽视了 20 世纪中国独特的“中外古今”文化冲突语境对其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获得的背景规约作用。后果之五：势必在方法论上将现代主义文学所体现的现代性品质，作为衡量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性标准，忽视了文学现代性品质自身所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正如朱德发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是个有序的动态系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文学自身所作出的历史选择。”^①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是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固定状态和固定时空的能指对象，而且是一个具有广泛发散性的所指过程，是一个具有丰富包孕性、形态多样性的意义开放系统。由于现代化作为一个普遍主义的概念，更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个未完结的历史，所以它很难形成一个理想的现代性的真实典型，来衡量所有国家和时段内的现代化现象。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我们认同于广义的现代化概念，即现代化是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20 世纪中国文学正是在古代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开始了自身现代化的历程，开始追寻和丰富自身的现代性，为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增添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文学形态。

1960 年在日本箱根举行的关于现代化特征的学术会议上，众多学者总结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八项特征：1. 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 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广泛的

^① 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6 页。

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不断增加;3. 社会成员在广大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参与;4. 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 全面推广文化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 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 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 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国际关系)。美国学者毕乃德将这些特征运用于1919年前的中国社会状态研究,以详实的资料和合理的论证,证明了到1919年前后时间,中国某些地区和社会的某些层次上已经沿着这条路迈出了重大的几步。^①更为重要的是,毕乃德还专门论述了上述八条特征中蕴涵的价值观念的根本变化,认为“到1919年,传统理想对于现在和未来是否适用,许多中国人已经产生疑问。这种倾向是非古的倾向,随之出现了一种近乎是疯狂的对新的价值观念的追求,以取代正在被抛弃的传统价值观念。这种倾向在1919年以后迅速发展。”^②

不是说毕乃德的分析 and 结论多么准确和深刻,而是他恰恰指出了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现代化素质的整体萌发,指出那个时代已经在精神的原点上寻求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时段,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由皇权、儒家正统观念、中央集权等等构成的统治秩序、社会结构已经被摧毁。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已经展示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所发生的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代性雏形,“中国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面临着总崩溃,中国旧文化思想系统在西方异质文化的猛烈冲击下也发生了整

① 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同注解①。

体性的动摇。这无疑促进了文学主体的心理变化和文学结构中新因素的增长,加快了文学变革的步伐,迎来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的新交响曲。”^①这一新交响曲就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奏响的,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向现代化的崭新基调。正是在五四新文化(学)运动前后的时段内,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已经整体上呈现为对现代现象的倾慕和自身现代化的渴望与确立。这种现象意味和标志着有史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理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开始发生全方位的秩序与结构转型。而文学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激进的先锋角色,承担了独有的历史重任。

我们知道,现世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从社会的结构和秩序来把握,还必须从人的体验结构和精神素质来把握。在诸多现代现象的形成中,最为深刻的变化就是人的实存本身的变化和人的生存标尺的变化。正如英克尔斯强调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②“五四”以前的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现代化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转变,不仅是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认知视野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结构本身的转变,是人的实际存在类型的转变。以新文学运动为重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鼓吹“人的发现”这一点上,获得了其现代性的坐标原点,从而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奠定了价值旨向。

五四新文化(学)运动所提倡的以“人的发现”为中心的诸多价值理念,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过程中深层的根本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的重要表征。20 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代初获现代性

① 朱德发:《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2 页。

② 转引自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译者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4 页。

心态、精神气质和体验结构,体现为那个历史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偏爱系统:以“人的发现”、“辟人荒”、“立人”等等话语为表达策略的“人本位”的价值追求。五四新文化(学)运动以“人的发现”为中心话语系统,体现了深刻的现代性人学思想:现代人的塑造和形成,意味着古典时代人的形而上品质或实质性本质的解体;人的最终依据从彼岸来到了此岸,人只被视为各种自然、历史和社会因素的总和,人的本质由自然生命和生活世界来界定;人本身成为人之自然系统中所有力量和禀性的现世欲望表达的基石和价值尺度,人本身成为人从自然和社会系统来营造其现实感觉世界的自足基设。自然状态意义上的自然人性理念和自然法权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等理念,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

如果我们认识到现代是指社会转变过程本身,而不仅仅是定位于社会转变所要达到的目标,现代化不仅仅是指社会向某个特定的“现代”之境迈进,而是指社会转变始终开放着的过程本身,那么现代中国文学以“人的发现”为话语表达策略的现代性品质,就在20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境遇中,获得了自己的形态与质态。对此王富仁先生有深刻的论述。尽管他将20世纪中国文学定义为现代主义文学有待商榷,但其实质性阐述仍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和中国人对‘圣人’的绝对遵从是达到把现实世界完全纳入到精神世界的统治中以实现人类精神理念的基本前提,他们的死亡意味着人类的现实原则的胜利,人的欲望的胜利,现实世界已不可挽回地落入了人的欲望的血盆大口之中。但是,只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世界、物质的世界、欲望的世界,人类也是无法获得幸福的,人类需要精神,需要爱,需要感情的联系,心灵的沟通。但现代人类的每一个人都已不是上帝,不是圣人,他们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威把精神的价值带入这个世界。他们不是‘神之子’而是‘人之子’。他们同是作为一个‘人’而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里,他们不可能像上帝一样在完全无欲无私的状态中成为单纯的人类精神的布道者。这加强了他们自身的分裂,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裂,同时也造成了现代人自身的人格分裂。中外现代文学是在人类的人格分裂中,在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感受里寻求

人类精神价值的文学。”^①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看到，正是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裂变格局中，诞生了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得以展开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

这一宏观历史文学语境，由传统与现代冲突、中西文化机体异质性冲突双重张力构成，所围绕的价值理想即是实现现代化。纵观清末以来的文化和文学论争，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新派，无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无论是强调民族本位还是主张“全盘西化”，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们思考的重心，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路径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与复古西化的二元对立，都隐含在“现代化”这一论域的统摄之中。百年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倡导的种种主张，都是在这一大语境规约下的不同探索路向。他们心里都清楚得很，无论强调传统还是主张西化，都是一种表达的策略和需要，真实状态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20世纪中国文学正是沿着这一价值路向，用自己的符号体系和话语策略来表达百年中国的精神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这种宏观历史文化语境，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台词，即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结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过去对传统文化中比较明显的缺陷大都是极为分散的反应转向广泛和积极的决心，决心要创造一个‘新中国’。”^②五四新文化(学)运动正是在启蒙目标纷繁选择的论争中，从整体上很快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奠定了一个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基本的社会价值目标，从而使它与20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结伴而行，产生了既对立又统一的人间悲喜剧。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更替是王朝国家的更替，而现代国家

① 王富仁：《中国现代化主义文学论(下)》，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② 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载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的建构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取代了王朝国家的形式。现代国家的形而上伦理正当性的根据是“此岸原则”，即根据自行负责的理性来建构其法权的和统治技术的理据，呈现为自主权利的世俗性本质。现代世界的国家秩序的正当性，不是由一个超越秩序来衡量，而是根据全体国民的理性能力和他们之间的契约和协议来衡量，从而形成人民民主、自由民主等等制度类型。由于在民族生存压力下形成的“古今中外”矛盾的激烈冲突和对抗，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很快从“五四”时代百家争鸣的格局中，转向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为特征的人民主权制度的追求。正是由于生成基础和发生机制的某种同构性，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就具有中国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

无论是启蒙话语、救亡话语还是阶级解放话语，尽管它们自身具有内在的价值取向冲突，但都程度不同地隐含着国家民族主义的权力话语欲望，构成了它在社会结构层面所具有的现代性社会理性品格，并且呈现出民族主义文化现代性的独异面目。这使它在“古今中外”张力语境中，造成了自身现代性形态和质态建构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具体体现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内部各种主义、各种创作倾向的相互对立和斗争，焦点即是普泛意义上和隐喻意义上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不同阐释与追求。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与伦理的理性现代性的统一和对立关系。与西方文学不同，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与伦理现代性的对抗，不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完形的状态下发生的，而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紧密绞合在一起，既有同一又有对抗，并且这一态势至今仍处于进行时状态。

因此，勘探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如果按照西方文学的发展与评判逻辑，如果拘泥于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的线性发展模式，如果以西方文学中审美现代性对抗社会现代性的表现形态，来裁定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发展历程中表现的性质，那么就只能得出它的性质是前现代性或近代性。

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永远也不会找到以西方文学现代性为模本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的现代性展现,只能将之置放于“古今中外”的张力语境中考察它的话语表达和精神体验,只能将之置放在 20 世纪中国人在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建构中考察它的价值追求和情感倾向。唯有如此,才能看到现代化追求作为活的灵魂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精神世界中所发出的血性律动之声。现代化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总体目标,已经和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追求、生命价值取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它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它当然是一个未完成式,然而却不是以“他者”为目标的未完成式。它过去的、现代的和将来的基本价值,将证明其现代性的合法性。

正如汉学家史华慈所强调的那样:“无论从五四之前的角度或现在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都可能不再被视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唯一决定性转折点。尽管如此,但它毕竟被证明是在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巨变迄今尚未终结。”^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正是在追求人的现代性这一价值支点上,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石,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一个开放的价值追求目标。它将以此作为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动力原点,不断丰富和发展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现代性,从而形成世界文学现代化体系中的中国文学的独特现代性形态和品格。

① 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载《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失落精神的民族,呼唤伟大的人格

——“五四”现代文化人格建构一瞥

“五四”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千载难逢的百家争鸣的时代。面对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汇,中国“五四”文化生态系统对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作出了历史性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在理性层面、价值层面和知识层面上,向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文化系统,发动了激烈的历史性全盘挑战。这是一个令人心仪而又难以复现的神话般的时代。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似,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力。

这次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不再是物质层面的坚船利炮、器物技艺,不再是制度层面的政治构架、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和教育体制,而是精神层面的人生智慧、价值模式和文化心理等等层面的现代性转换。这次以“伦理的觉悟”为理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重整国民性、重塑民族文化心态。反观以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往往缺乏一种从多维文化视野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这一极为重要的“中介”的理性观照和反思。我们认为,社会理想文化人格的嬗变是考察这一转换的极为重要的“中介”。“五四”时代现代文化人格塑造,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直接文化心理动力。因为,异域文化思想的涌入、社会政治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中国思想文化自身发展逻辑发生变化等诸种因素对文化转换的影响,只有为创造主体接受,才能转化为创造主体的内在素质,从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原动力,去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

“人格”一词源自拉丁语“persona”，本义指在特定仪式表演中人所带的面具，具有一种原始文化的符号象征意味，后来逐渐演化为特指个人和社会人的道德文化价值层面的内涵和品质。而所谓理想文化人格，意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中形成，并得到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承认和推崇的人格楷模。理想文化人格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成，随着历史文化的衍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一整套文化人格的模式，并且能够超越政治、经济层面和道德文化素养的差异而具有某些普遍性的品质和标准，是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系统极力维护、崇尚的文化人格典范。同样，社会理想文化人格积淀为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规引和制约着社会人的行为和价值模式，以理想化、抽象化的文化人格规范，引导和召唤着社会人的文化向心性。

纵观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文化人格内蕴，集中体现于“君子”这一文化人格典范。尽管“圣王”这一人格理想是传统理想文化人格的极致，但是由于行为操作上的难以普及性和大众化，“君子”型文化人格由于其所表现出的适中性，便成了从庙堂到草野的日常人伦文化实践中，人人均有可能达到的人格标准。这种“君子”型理想文化人格构成，以儒家伦理文化精神为主导，附之以释道文化人格之补充，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的人格价值趋向：1. 建立在日常人伦层面之上，偏重于自我内在超越、自我完善的道德化伦理文化倾向。由于缺乏外在超越的所谓“天职”精神的动力源泉，这种文化人格倾向过分依赖抽象的主体精神的虚弱支撑。2. 以这样的文化人格崇拜为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往往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文化体系中衍化出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机制，强调最终要达到以“内圣外王”的方式来塑造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但是在动荡多灾或者恶性循环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理想文化人格模式易蜕变为“中庸”的处世哲学，所谓天下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明哲保身，缺乏一种对世俗社会强烈的充满激情的紧张对立精神和由此而导致的改造现世的文化人格动机与献身精神。3. 这种理想文化人格，重视人伦融合有序、社会规整平和、内在品质德行和世俗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这种理想文化人格往往具有温文尔雅、达观大度、自尊自重、心怀天下